

茗雪风流

人文视点

吴昌硕与俞樾交游考——兼及吴昌硕在诂经精舍学习时间考



吴昌硕《岳庐集》俞樾序跋（浙江省博物馆藏）

梅松

俞樾（1821–1906）是德清（与安吉同属湖州府）人，与吴昌硕（1844–1927）有同乡之谊。俞樾是晚清时期一代大儒，吴昌硕在杭州诂经精舍曾从其学，故终身执弟子之礼。俞樾于同治七年（1868）受浙江巡抚马穀三（新貽，1821–1870）之聘，担任杭州诂经精舍主讲。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以年老为由，辞去讲席之职，前后共达三十年。期间，俞樾在杭州建有俞楼，在苏州建有曲园，因此常在两地居住，与吴昌硕关系密切吴云（1811–1883）、杜文澜（1815–1881）等人均与之互有往来。

一、吴昌硕在诂经精舍学习时间考

吴昌硕在诂经精舍学习的时间，历来所说不一。按吴长邨所编《吴昌硕年谱简编》云，吴昌硕先后有两次发笈杭州，入诂经精舍从俞樾同学。第一次是同治八年己巳（1869）；第二次是在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，并在这时认识画家吴滔（1840–1896），但遗憾的是没有注明出处，不知所据？而林树中所编《吴昌硕年谱》则作同治十一年（1872），其依据是吴东迈《艺术大师吴昌硕》。那何以为准？

实际上在吴昌硕《石交集》施浴升条下有“同肄业西湖二年”之云，由此可知吴昌硕与施浴升同时入学。朱镜清(1849–?)《金钟山房诗序》云：

曩己巳（1869）、庚午（1870），偕安吉张子中（行孚，生卒不详）盐尹读书西湖精舍，每当水槛露晓，岩幌星初，夏课午歇，秋兴倏报，相与纵谈，结客缕数，测交辄称其同邑施君旭臣不置□云。已而群贤□□之地，才经识面；名流挥辔之会，欣然论心。倾倒之忱，时萦于五内；往还之契，几及夫十年。

由行文中可知张行孚、朱镜清在诂经精舍的时间是1869年至1870年。而时施浴升尚未到西湖诂经精舍求学，朱氏对于施浴升其人的了解，是通过张行孚的介绍而得知，后来是在某次聚会中才得以相识。相交十年之后，朱镜清才读到施浴升的诗文，并为其作序。由此可知吴昌硕、施浴升入学诂经精舍的时间要晚于1870年。1871年，吴昌硕与施酒结婚，因此吴昌硕入学诂经精舍的时间最有可能是1872年至1873年间。

这在俞樾致王棻的信札中，我们也找到一点线索：“顷由陈桂甫茂才交到惠书，词旨贬抑，称谓谦卑，不敢当！辱以先德行状属为志铭，夫表微阐幽，必待道德文章之士，仆（俞樾）非其人也。”据编纂者考证，“同治十三年（甲戌，1874）四月，王棻《致俞荫甫先生书》中称，‘去岁十二月二日，陈桂甫过黄，递于尊函并先君墓志铭一首’，应即此札，故当作于同治十三年（1873）”。陈桂甫，即陈殿英，是吴昌硕诂经精舍的同学，关系颇密。《石交集》有传：

陈桂甫茂才，名殿英，号惕庵，台州太平人。博学工书，篆刻绘事皆造其妙。游学武林，肄业诂经精舍，为高才生。每试必冠侪辈。余与茂才同肄业湖上，过从甚密。时余方学分篆刻印，数有清益，茂才口讲指画不倦。家贫授徒，自命所居曰铁耕楼。尤嗜古学，诠释经训多创解。又为《老子注》，发挥皆依儒理。书似颜平原，参以分篆。年逾四十，犹一领青衿，可胜叹哉。近闻其纳粟得官，未知今在何省？

结合俞樾和王棻的信札可知，1873年陈殿英应该也在诂经精舍学习，因此王棻才会请陈氏代为传书，是年十二月陈氏“过黄（黄岩）”，很有可能也是肄业回故里。由此也可以推知吴昌硕在诂经精舍学习的时间是在1873年前后。这在“吴俊长寿”印款中也可以得到证实：“哲上吴俊卿制



于唐唐，时癸酉（1873）暮春之初。”不过这一年十月以后吴昌硕因《孝丰县志》采访之事转辗到了上海，第二年秋，吴昌硕则已经在苏州了，先后与杜文澜、吴云、金树本等人订交。这通过《篆云楼印存》中各家的题跋中可知，杨伯润、汤经常、吴淦于1873年题于上海，金树本、杨昌珠、金寿伯、尤寿等人于1874年题于苏州，地点转换非常明显。另外，其“苍石”印款云：“癸酉十二月，苍石作于沪”，也可以为证，说明他在

1873年十二月在上海。这样吴昌硕在诂经精舍的时间应该从1873年前推，即1872年至1873年的两年时间，即《石交集》中所谓的“同肄业西湖二年”。由此看来，吴长邨《吴昌硕年谱简编》有可能是将“同肄业西湖二年”分作了两次，而林树中《吴昌硕年谱》则是明显的漏掉了一年。

另外，根据吴昌硕的长子吴育出生于1873年八月十七日，以此推算吴氏婚娶时间是在1872年十月前后。因此吴昌硕赴西湖诂经精舍读书的时间也很可能是在是年秋闱之后，目的是为下一年的乡试作准备。由此推



吴昌硕《篆云楼印存》俞樾题跋（浙江省博物馆藏）

知，吴昌硕在诂经精舍学习的时间是1872年秋至1873年秋之间，虽曰两年，实际上只有一年。

二、吴昌硕与俞樾交游钩沉

吴昌硕与俞樾的订交时间，至少可以从其入学诂经精舍的时间算起，即1872年。吴昌硕从诂经精舍肄业以后，与俞樾依然保持联系。这主要是吴昌硕自1880年以后寓居苏州，主要活动地点也是在苏州及其附近。而俞樾虽然在杭州诂经精舍任主讲，但很多时间却仍然是住在苏州，与吴云、杨岷、顾文彬等人往来甚密，因此吴昌硕有时间 and 机会与之交往。吴昌硕曾请俞樾为其《篆云楼印存》题跋：

吴子香补精于缪篆，尝集其所刻为一册，曰《篆云楼印存》，属余题之。余观其笔意，精妙中不失古法，觉杨、王、姜、赵诸家典型，去人未远也。昔李阳冰称篆刻之法有四功：年造化，易受鬼神，谓之神；笔墨之外，得微妙法，谓之奇；艺精于一，规矩方圆，谓之工；繁简相参，布置不素，谓之巧。夫神之一字，固未易言，若吴子所刻，其殆兼奇、工、巧三字，而有之乎？癸萌俞樾。

该册现藏浙江省博物馆。从俞樾的序言可知，当时吴昌硕有印蜕并呈，现存俞樾、杨伯润（1873年10月）、汤经常（1873年仲冬）、吴淦（同前）、金树本、杨昌珠、金寿伯（1874年11月）、尤寿诸家题跋。因为金树本与吴昌硕订交于杜文澜曼陀罗馆，时在1874年秋。由于杨伯润的题跋是在1873年10月，因此笔者推测俞樾的题跋是在在此之前，即吴昌硕在诂经精舍肄业之际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也算得上是肄业的赠言吧。这也可能是俞樾给吴昌硕最早的一份题辞。

1900年秋，吴昌硕将刻《岳庐诗续》，求序于俞樾：

吴子苍石曾刻其所著《岳庐诗》，以问世而比年以来，又得如千篇。哀录为《岳庐诗续》，附以题画诗，袖以示余。余读之朱弦疏越，一唱而三叹，九梁插花，步摇为古，知君之诗老而愈工也，乃君之宦况则何其老而愈穷耶！虽然方今事孔亟矣。君尝小试于安东，亦未能竟其所施，不如姑以吏隐于吴，金石书画之外，以诗自娱，亦庶几漆园之傲吏矣。光绪庚子

秋，曲园俞樾书。

是年，俞樾早已辞去诂经精舍主讲之职，寓居苏州。而吴昌硕在此前一年，曾任一个月的代理安东令，现在仍以小吏的身份，为生计四处奔波。面对吴昌硕如此窘况的宦境，俞樾在小序中实有劝诫之意。即劝吴昌硕以金石书画谋生，不必再在仕途上浪费时间。是年十二月二日，俞樾八十岁寿诞，吴昌硕有《曲园先生八十寿赋祝》（庚子(1900十二月二日)）诗奉祝：

先生历四朝，苍然乔松姿。山水阜秀灵，乾坤老经师。今年正八秩，适逢世颠危。六龙忽西幸，北直多疮痍。有如蓬莱水，欲变桑田时。多寿不复喜，忧国无良医。不进介寿酒，却赋感事诗。强颜慰先生，著作且自怡。我朝德泽厚，民志尚未移。弗忧金瓯缺，中兴当有期。不然随杖履，去采商山芝。漱泉餐玉英，长歌一扬眉。似此当寿觞，长者弗我嗤。眼前烂朱霞，春在红梅枝。

俞樾经历了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四朝，故诗中有“先生历四朝”之云。1900年，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，造成局势失控的局面，史称“庚子国变”。著名的圆明园就是在这次运动中，被焚烧抢夺一空。之后不久，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辛丑条约》。在动乱中，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出京城向山西等地避难，史称“庚子西狩”。因此吴昌硕在诗中除了感时伤怀之外，还对时局充满了迷茫之情。此诗之后，吴昌硕意犹未尽，又赋律诗二首：

腊月逢华诞，芳筵举酒厄。青山高笔冢，绛帐老经师。离乱衰年感。苍凉自寿诗。唾壶应击破，垂首念疮痍。

南极一星现，西巡万马寒。彩衣欣祝寿，老眼盼回寰。发更忧时白，心存报国丹。灵芝何日采，持献劝加餐。

从诗文的内容而言，这二首更接近祝寿的意思。

吴昌硕与俞樾之间的信札颇为少见，《俞樾书信集》中有一札，云：

俊卿世仁弟惠览：

前肃复函，曾照入否？比惟兴居佳胜为颂。局闻开雕《通鉴后编》，叔衡太守（生平不详）属梦香（冯一梅，1849–1907）赴局校对，但梦香适患湿气，两脚肿痛，不能举步，一时未能来杭。属兄转达，请吾弟与衡翁一言，或即携此书转告之，亦无不可。兄病亦只如常，腰脚软弱，头目昏花，每日午后使人床昇至外斋一坐，恐亦与梦香一样矣。手肃布洒，即颂秋祺。

世愚兄樾顿首

再者，局中刻《绎史》即梦香校对，由刻字匠寄越中，梦香即在家校对，并可取徐氏藏书楼书籍考证异同，转似较在杭为胜。未识刻《通鉴后编》可仿照否？

樾又拜

据编纂者考证，信札中提到的《绎史》浙江书局刻本书本页为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十月，书中多处有“冯一梅校”字样。还有信中提到的“徐氏藏书楼”，应该是指徐树兰于1904年在绍兴建立的古越藏书楼。由此可知该信札应该作于1904年左右。是年吴昌硕任黄浦江义渡局委员之职。叔衡太守，不详其人，待考。

吴昌硕为俞樾所刻印所知不多，有“曲园六十以后作”“曲园居士俞楼游客又台仙馆主人”“臣樾之印”“曲园”，“俞樾私印”，款云：“曲园夫子大人海正，门生吴俊卿谨刻。”由于这些印，均无具体时间可征，故所刻时间不详。按1880年俞樾六十岁，因此“曲园六十以后作”，很有可能刻于1879年至1880年左右。是时，吴昌硕捐资纳官，需次苏州，因此有可能是俞樾六十岁生日时，吴昌硕在苏州所刻，而且从印文的篆法来看，与吴昌硕为吴云所刻的“两罍轩金石考藏”等印风格相近。



吴昌硕为俞樾所刻印章

“红船”，嘉湖一线牵

蔡忍冬

几度梦嘉兴，几度梦南湖。

嘉兴是笔者外婆家，嘉湖曾难分彼此。旧时京城闲人诗赞湖籍名伶朱琴心得句“家近鸳鸯湖上鸳”，鸳鸯湖就是南湖的雅称，意即嘉湖两地靠得很近；我们小时候去杭州，旁人问起来自何地？祖父会答嘉兴方向的。如今多数快退休的嘉兴文人，时常会忆起年轻时在湖州的“嘉兴师专”求学；嘉兴人聊起勤俭路上的“嘉兴旅馆”，会说撤地建市时里面住满了从湖州分流来的干部。

我好多年没去嘉兴了，今为舍妹之定居地。初夏时节，借着探亲，举家顺道游览了久违的南湖。旅游通常都会直奔主题，这是挺无奈的选择，即所谓随大流。也算是机缘巧合，路边停车位一直排到南湖西岸，于是，我们便有幸由揽秀园踏入这座南湖大景区。

嘉兴，因禾而兴，因水而盛。古人赞曰：“东会沪渎，西控语溪，襟带具区，独揽其秀”。我们从揽秀园清水墙门进去，右转穿过海菜式园门，眼前豁然一亮，清水环绕着黄石假山，山巅立有翘角红亭，绿荫碧池间倒映着对岸复建的壕股塔影。园以碑刻胜，惜置入玻璃框，便兴味索然。一组明代的石人石马尚可一观，这组文臣武将像，原在北门外的小姚坟，是小学生春、秋两季的远足之首选。只是石像所立全位置全部背光，只能看到隐隐约约的身影，倒也平添几分神秘感。

出揽秀园过文星桥便步入南湖东部景区。文星桥为三孔石拱架构，与湖州潮音桥一样有着哑巴桥的俗称，提醒过桥洞时乘客少说话，以便水手不分神，确保航行的安全。嘉兴少山，故人们对坟墩、高桥、砖塔等大平原上相对较高的建筑有着特殊感情，常作为“爬山”的替代物。公园沿途，内有湿地外有长堤，垂柳与菰蒲对歌，多了几分乡土韵味。顺便插一段家庭趣闻：舍妹生于嘉兴，祖父曾赐名南菱，即南湖红菱，最终由父亲定名醉李，系嘉兴的另一种珍果，又称槐李，色艳香甜，为李中珍品。

路边五色月季花开得正旺，湖心岛一直在视线中游弋，我们在绿荫下一路向东徒步数里，终于到达会景园的游客中心。游船码头已今非昔比，主楼匾额“烟雨楼前”有点诗意，水之驿旁“初心邮局”兼售文创产品，进去看到展陈的老搪瓷茶缸，印有“人民邮电”“嘉兴地区”等红字甚为眼熟。1979年5月，嘉兴地区群艺馆创刊《南湖》文学丛刊，由许胤丰主编，是在湖州编印的，后请茅盾题签，共出刊16期，今已较难集齐。



文学季刊《南湖》由茅盾题签



湖郡女塾红楼旧址

园的背面，仅让其露红楼一角，这就是少时不懂园林而忽略的叠石佳例。

五楹二层的烟雨楼，重建于二十世纪初年，由董必武补额。楼下正厅楹联：“烟雨楼台，革命萌生，此间曾着星星火；风云世界，逢春蛰起，到处皆闻殷殷雷。”亦为董必武亲撰并书，他曾经于1964年重访南湖。正厅主匾“分烟话雨”由诸辅成题写，两侧壁间悬挂有宋庆龄、沈钧儒、郭沫若、沙孟海、陈从周等名人墨宝。登斯楼也，雕窗绮阁，四面通透，湖天一览，惟不见山。幸高楼拔地，若帆樯林立；叹正午阳光，令烟雨消散，倒也别有一番现代化的壮美豪情！

清乾隆皇帝六下江南，曾经八次登烟雨楼，在此留下两块御碑，在最后一次南巡之后，他还于承德避暑山庄仿建了一座烟雨楼，不过建楼容易配景难，南湖烟雨也只能永驻心怀啦。烟雨楼侧设来许亭与鉴亭。来许亭为清代当地土绅为感念知府许瑶光而建，1912年孙中山曾来游于此，今由俞平伯、程十发补额。鉴亭壁间的“鉴亭铭”由许瑶光所作，还有吴昌硕书“画家清华墓志铭”，见证了嘉湖之间书画家惺惺相惜的动人佳话。宝物有南宋岳珂旧藏的洗鹤石盆，以及清代某官从帝京古北口运回的柏化石等，闲情鸥远，逸兴云翔，访古游程就此告一段落，即将切入的是红色记忆片段。

“革命声传画舫中，诞生共党庆工农。”1921年8月3日，中共“一大”会议由上海转移至嘉兴南湖画舫上继续召开，系采纳与会代表李达夫人王会悟所建议而决定的。当时上海与嘉兴通火车，而南湖与火车站毗邻，再到游船上开会就更为安全了。

乌镇，清朝归湖州府乌程县属，民国时期由吴兴县辖。

王会悟与沈雁冰同为乌镇人，王、沈两家还沾点姻亲关系。沈德鸿，字雁冰，即现代文学家茅盾，其祖父是王会悟父亲的姑母所生，按辈分比沈德鸿小2岁的王会悟是他的表姑妈，两人自幼便在一个书塾里同学。1910年沈雁冰曾在湖州府中学堂求学，1917年他又推荐王会悟到湖郡女塾求学，也就是日后湖州“嘉兴师专”的红楼旧址。王会悟在湖郡女塾期间属半工半读，并深受新文化思想的影响，曾经用白话文给陈独秀写信谈感受，陈独秀得知新文化思想已潜入教会学校很是欣喜。1919那年“五四”运动爆发，王会悟带头剪短发、倡平等，在湖州积极参加声援北京的爱国运动。为躲避封建旧势力的纠缠，王会悟在同学的帮助下抵达上海找到沈雁冰，被安排在上海女界联合会做文书，又经沈氏牵线结识李达成并为助手，1921年4月，两人在渔阳里陈独秀的家中举办婚礼结成革命伉俪。前不久播放的电视剧《大浪淘沙》，就以李达与王会悟为主线，串联起13位中共“一大”代表各不相同人生轨迹，很有现实警示作用，成为笔者追剧的心得。

溯源起嘉湖文脉总是密切相连。比如在浙江名声很大的“南湖一家人”故事，主人公张新志与徐金巧夫妇，年轻时都曾在湖州的“嘉兴地区京剧团”工作多年，剧团解散后他们回嘉兴被分配到南湖景区再就业，演武生的张新志动手能力较强成了红船文保员，唱旦角的徐金巧嗓音甜润吐字清成了南湖讲解员，恰是南湖红船成就了他俩的后续荣光。

旅游的高潮桥段必须留着压轴。我们细致地转了一圈湖心岛，快步来到闪光处瞻仰。南湖画舫，俗称丝网船，曾名革命纪念馆，如今简称红船，并引申出“红船精神”。虽然看不到船舱内部的结构，但记起见过一张着色的老照片，知道舱内还是挺富丽堂皇的，船棚轩，单夹弄，共分前、中、后三舱，房舱设朱金木雕屏风并带有卧榻，还有方桌、靠椅、几凳、茶具等一应俱全。当年出面联系租船事宜的人，是沈雁冰的内弟孔另境，那年17岁的少年正在嘉兴上中学。乌镇的王、沈两家为中共“一大”在嘉兴的顺利召开功不可没，同年，沈雁冰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。

伫立红船前，在摄影留念的同时笔者也是思绪万千：日出南湖，开天辟地，但革命的征程恰是充满着艰辛，经历北伐剧变，南昌起义；三湾改编，井冈会师；湘江血战，遵义掌舵；北上抗日、中流砥柱；开国大典，屹立东方；自力更生，两弹一星；乒乓外交，转动地球；终于迎来改革开放，勇立潮头；脱贫攻坚，砥砺前行；星辰大海，风景独好这一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新时代！百年伟业，不忘初心。

在红船码头的湖堤上回望烟雨楼风景佳绝，红墙飞檐间两棵明代银杏树参天耸立，还有黄桤、榔榆、朴树、槲叶等百年以上的古木成林，若秋日到访想必更是色彩斑斓，不过初夏的苍翠更显生机勃勃。墙垣中段嵌着“钓鳌矶”石刻，系出明人手笔，有苏黄之姿韵，楼前荷池呈现南湖的形状。明代绍兴人张岱曾经记游南湖，开篇：“嘉兴人开口烟雨楼，天下笑之。”令几代嘉兴人都太不服气，如今的烟雨楼可真是独占鳌头啊！

寒来暑往数百年，世事难料实太多。百年前各地代表在画舫上开了一个不太起眼的秘密会议，宣告中国共产党党的成立，自此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，嘉兴南湖也赢得了天下人的诚服与景仰。南湖红船，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初心起始！